

第一章 导 论

一国对外贸易能否促进该国经济增长，以及如何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一直是经济界广泛关注和研究的课题。本章将该课题有关的基本概念，有代表性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作一个简要的介绍，以便为后面应用于研究中国的有关实际问题上。

第一节 经济增长理论

一、经济增长的定义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体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的持续增长。一般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经济体是指一个国家，而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指标一般采用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并不能反映该国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应该采用人均实际收入增长这个指标来衡量经济增长。然而，毕竟总产出与人均产出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现代人口的增长已逐步趋于稳定和缓慢，总产出与人均产出的增长也就逐步趋于一致了。

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作了较大贡献的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Kuznets）对经济增长的含义作了更为具体的描述：“经济增长是为人们提供各种经济物品的能力的长期增长，这一能力的不断

增长是由于技术进步以及体制和观念的相应调整。”^① 这一定义实际强调了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源泉：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值得注意的是：要素投入的增加，虽然也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但这是有限度的。在研究现代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时，从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观点来看，各种生产要素已经基本被充分利用，要素投入的大幅增加已经不可能，而要素投入的周期性较大幅度的增减实际上是经济周期造成，在经济繁荣期通过利用衰退期的闲置要素所产生的那部分总产出增量只是一种短期的波动，无法持续相当长时间，故不能作为经济增长。然而，反观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在开始工业化进程后和相当长时期，要素投入的增加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只有实现以要素投入增加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向以技术进步为特征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后，持续的经济增长才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

因此，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时，利用闲置资源增加要素投入引起的总产出增加，应该作为经济增长来分析。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学说就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在农业部门存在大量闲置劳动力，此时开始的经济增长就是以工业部门不断利用农业部门的闲置劳动力为特征的。

另外，经济增长这一概念往往与经济发展混为一谈。实际上，经济发展比经济增长有更广的内涵。经济增长仅仅指产出的增加，而经济发展是指产出的增加以及这种增加引起的经济结构的变化，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可见，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密切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

有些经济学家把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作为两个绝然无关的概念，认为研究经济增长的“增长经济学”是以发达国家为对象，而“发展经济学”则是以发展中国家为对象。如哈恩和马修斯(F.H.Hahn and R.C.O.Matthews)认为：在二元经济的场合，

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 发现和反思》 美国经济评论 ,1973 年(63):247~258 页。

“增长理论只运用于发达部门，而落后部门的问题必须作为发展理论（而不是增长理论）的一部分”。^①

然而，应该看到，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把它们绝然分割开来显然是不合理的。当然，也应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机制通常不够健全，一些非经济因素往往对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而现代增长经济学主要是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其中一些基本的假设条件在发展中国家无法满足，因此，在将这些理论，特别是其中的定量分析方法，应用到发展中国家时，应该进行必要的修正。

二、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家关心的一个重大经济课题。从古典经济学产生之日起，经济增长问题就是经济系统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倾向于把握事物的整体。他们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往往不是把眼光单纯地停留在经济领域，而是试图全面把握一切与之有关的因素，包括社会、自然和心理因素。因此，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也体现了这一特点。由于考虑的因素比较纷繁复杂，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相比，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定性分析，较少采用定量分析方法。

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年）中论述了经济增长的问题。他认为，一个经济系统的正常运作乃至经济增长是社会是人们追求自身利益行为的必然结果。只要政府能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市场机制和相关的法规，个人追求利益的正当动机就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为了使自身利益得到最大满足，人们会尽最大努力去提高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斯密把劳动分工作为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而劳动分工的深化又取决于资本积累。人们为了追求更大的自身利益，会自觉将现

哈恩和马修斯：《经济增长理论：综述》，《经济杂志》，1964年（74）：779～902页。

有的部分消费能力转化为投资，从而增加了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增加又促进了劳动分工，提高了生产率，进而增加了总产出，总产出的增加一方面进一步增加资本积累，另一方面提高了消费能力，并刺激了人口增长，从而使经济规模不断扩张，劳动分工也就不不断深化，使得经济增长在这种良性循环中不断持续。

斯密还提出了“绝对利益”理论，分析了国际贸易引进的国际分工对各国生产率提高的重要作用。同时，他有关对外贸易是“剩余产品的出路”（Vent for Surplus）的学说也论述了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李嘉图继承了斯密有关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的思想，对经济增长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但是，由于他把经济增长理论建立在马尔萨斯的人口法则和要素报酬递减规律之上，结果得出了在固定数量的土地上，经济将会进入一个长期均衡的稳定状态的结论。

总的说来，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并提供了一些基本概念。其中包括竞争行为和动态均衡概念；报酬递减规律及其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人口增长率与人均收入的相互作用以及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等有关论述。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哈罗德（R.E.Harrod）1939年的研究和多马（E.D.Domar）1946年相似的研究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开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大萧条刚刚结束，需求不足造成投资不足，从而制约了经济增长的问题非常突出。因此，哈罗德是从需求角度着手，研究实现充分就业的长期均衡经济增长的条件。

哈罗德根据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从储蓄（S）与收入（Y）保持固定比率（ $S = sY$ ）以及投资（I）与收入的增量（ ΔY ）保持固定比率「 $I = v(\Delta Y)$ 」的基本假设出发，再根据宏观经济均衡条件，计划的投资等于计划的储蓄（ $I = S$ ），推导出哈罗德基本

方程式：

$$GY = \Delta Y/Y = s/v$$

这一等式表明，要实现充分就业的长期均衡，必须使经济增长速度按 s/v 的比率增长。同时，根据 $v = K/Y$ 还可以推出资本也必须以 s/v 的固定不变的速度增长。哈罗德把这一长期稳定的增长率称为“有保证的增长率” (G_w)。而在劳动与资本完全不可替代的条件下，劳动增长率所决定的自然增长率 (G_n) 必须刚好等于 G_w ，才可能使实际增长率 G 等于 G_w ，从而实现 $G = G_w = G_n$ 的“黄金增长”。即保证整个经济社会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各种宏观经济变量都能等比例地、稳定地长期增长。一旦经济增长偏离这一状态，就永远无法恢复稳定增长状态。例如，一旦 $G_n < G_w$ ，实际增长最大只能等于 G_n ，而小于 G_w ，使得计划的储蓄超过计划的投资，投资者将会根据这一需求不足的市场信息进一步减少投资，从而使实际增长进一步放缓。这种恶性循环将使实际增长离 G_w 越来越远，经济社会将陷入长期停滞状态。另一方面，当 $G_n > G_w$ 时，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实际增长率就会大于 G_w ，计划投资大于计划储蓄，经济社会将会处于长期高涨和持续通胀状态。然而，由于 G_n 与 G_w 都是各自由一些独立的外生变量所决定，故欲使两者相等只能是一种难以实现的巧合。

由于哈罗德—多马模型是假设要素之间不具有可替代性，他们推导出来的保证充分就业的长期均衡增长率，是一个难以实现的不稳定均衡。但是，在实际的观察和分析中，要素的可替代性，尤其是资本与劳动的可替代性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因此，虽然他们的研究在当时引起了广泛注意，但由于他们的假设和研究结果都与后来的经济增长实际不符，故未能被后人接受。

对现代经济学作出较大贡献的经济学家要算索洛 (Solow) 和斯旺 (Swan)，他们 1956 年的研究认为，由于资本与劳动的可替代性，充分就业的稳定均衡增长是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节而实现，因此，只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机制，充分就业的长期均衡是一个经

济增长的必然趋势。这一长期均衡增长率只取决于供给方面，即要素的增长和技术进步。

索洛—斯旺模型是根据规模报酬不变条件，将生产函数变换为：

$$Y = F(K, L) = L \cdot F(K/L, 1) = L \cdot f(k)$$

即： $y = f(k)$

其中， $y \equiv Y/L$ ，表示人均产出， $k \equiv K/L$ ，表示资本—劳动比率。

另外，由于资本增量等于投资减去折旧，故有：

$$dK/dt = I - \delta K = s \cdot L \cdot f(k) - \delta K$$

其中： s 为储蓄率， δ 为折旧率。由此可推出：

$$\left(\frac{dk}{dt}\right) = s \cdot f(k) - (n + \delta)k$$

其中： $n \equiv \left(\frac{dL}{dt}\right)/L$ ，即人口的增长率。该式即为索洛—斯旺模型的微分形式。它表明，人均资本的增长率等于人均投资 [$s \cdot f(k) = I/L$] 减去人均资本的有效折旧 [$(n + \delta)k$]。由于假设生产要素边际产出递减，故有：

$$f'(k) > 0; f''(k) < 0$$

由此可知， $f(k)$ 是一个凹函数。由图 1.1.1 可知，使 dk/dt 不小于零的 k 值最大只能是 k^* ，这时的 $dk/dt=0$ ，此时， k 值再继续增加的话，就会使有效折旧大于投资，使 k 值减少。

因此， $k(k^*) = 0$ 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点。即：

$$s \cdot f(k^*) = (n + \delta)k^*$$

由索洛—斯旺模型推导出的长期均衡表明：一国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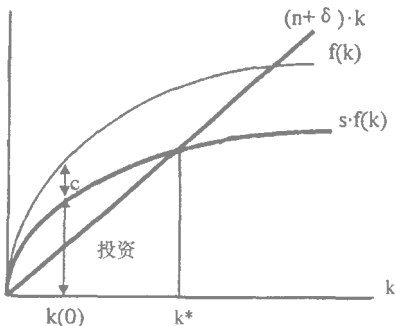


图 1.1.1 经济长期均衡增长

均产出增长最终会停止，而最终的长期均衡又完全取决于两个外生变量：储蓄率和人口增长率。

然而，对现实的观察发现：一国的人均产出是可以保持持续增长的，这应归于技术进步的作用。因此，50~60年代的增长经济学家在生产函数中加入了随时间自然增加的技术进步变量，使得人均产出的长期持续增长成为可能。但是由于将技术进步当成外生变量，所解出的长期均衡主要由作为外生变量的技术进步决定，这使得经济增长模型本身无法对长期的经济增长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为了走出经济增长理论的这一困境，60年代以来的增长经济学家的主要努力可以概括为：将增长模型的外生变量变内生化的尝试。例如：卡斯（Cass 1965）和库门（Koopmans 1965）就根据个人在随时间变化的预算限制下，通过选择消费和储蓄的比例，使用动态效用最大化的原理，假设储蓄率为人均资本 k 的函数，使得储蓄率变为内生变量。另外，威尔（Weil 1989）和巴罗（Barro 1994）等经济学家根据最落后国家的人口增长率随人均收入提高，而一般国家则随人均收入下降的观察，将人口增长率作为人均产出的函数。并且，还根据移民以及工作与休闲偏好等经济现象，将人口增长率进一步变为内生变量。

对技术进步这一变量的研究则是学者们完善增长模型的重点。阿罗（Arrow 1962）和舍幸斯基（Sheshinski 1967）认为技术进步是产出和投资的副产品，即人们可以在生产过程中“边干边学”（Learnig by doing），从而积累起技术和管理能力。因此，技术进步是产出或投资的函数。罗默（Romer 1986）等人引进了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广义资本概念，认为由于人力资本产生的知识积累有外部效应，故资本的边际产出可以是递增的。由此构造的增长模型可以推出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埃进（Aghion 1992）等人则研究了R&D对技术进步的作用。最近一些学者提出了知识传播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认为由于先进国家研制新技术的成本要比落后国家模仿这些技术的费用高，故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应高于先进国家。

第二节 贸易促进经济增长原理

在经济理论的研究中，有关对外贸易能否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一直是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有关的研究著作和论文繁多，本节介绍一些影响较大的有关学说的主要思想。

一、国际分工学说

国际分工是指世界各国间的劳动分工。它是国内社会分工超越国界的发展结果，是国际贸易的基础。有关国际分工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国际分工产生的原因，分工形式、内容以及产生的效果，从而也就部分解释了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在 1776 年发表的《国富论》（*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中提出了“绝对利益”理论（*Theory of Absolute Advantage*），用以解释国际分工产生的原因、方式以及效果。亚当·斯密主张：“如果外国能以比我们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我们就应该用我们自己有利的产业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一部分向他们购买。”^①这一主张，指出了各国应参与国际分工并生产和输出自己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使各国都享受到自由贸易所带来的利益。为了证明这一主张的正确，亚当·斯密从国内社会分工出发，说明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及有利改良工具和发明机械，因此，每个人都专门从事于一种物品的生产，然后进行交换，对每个人都是有利的。正如裁缝不为自己制造鞋子，鞋匠也不为自己缝衣服一样，一个国家也不应生产所有自己所需要的产品，而应生产自己有绝对优势的产品，然后进行交换，这样的国际分工必然会对各国都有利。亚当·斯密认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理》，商务印书馆，1974，下卷，28页。

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增加国民财富的重要条件之一，而分工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第一，分工使劳动者从事专门的工作，故可以提高熟练程度；第二，由于劳动者专门从事一项固定的作业，可以节省诸如由一项作业转到另一项作业等与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时间；第三，发明和改良专门作为某项作业的工具或机械比较容易。

大卫·李嘉图 (David Ricardo, 1772~1823) 在 1817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比较利益”理论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也称“比较成本”学说 (Doctrine of Comparative Cost)。这一理论解决了当一个国家在所有产品的生产上都占有绝对优势时，是否应该参加国际分工及如何分工的问题。

比较利益学说主张：“各国应集中生产优势较大或者劣势较小的商品……这样的国际分工对贸易各国都有利。”^①就是说，在各种商品的生产上都占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应集中生产优势相对大的产品，而在各种产品的生产上都处于劣势的国家，应集中生产劣势相对较小的产品。为论证这一学说，李嘉图还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推导出在两个国家、两种商品和一种生产要素（劳动）的条件下，按比较利益理论进行国际分工所产生的贸易利益。这样，就使得比较利益学说有比较严密的逻辑性。而且，运用李嘉图的数学模型，同样可以证明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学说的正确性。

现代国际贸易学说的开拓者奥林 (B. Ohlin 1933) 根据赫克歇尔 (E. F. Heckscher) 的思路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 (H-O 模型)，更深入地解释了国际分工的模式及其产生的贸易利益。这一理论不仅用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方法解释了比较利益理论有关贸易利益的问题，而且，还进一步分析了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他认为，比较利益是由产品的要素含量以及各国拥有这些要素的丰富程度所决定。例如，资本相对丰富的国家在资本密集产品上有比较优势，而劳动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说原理》，商务印书馆，1976年，110、112页。

力相对丰富的国家在劳动密集产品上有比较优势。因此，一国将出口那些密集使用其丰富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

以微观经济学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和无差异曲线，可对比较利益理论以及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进行较为直观的说明。

如图 1.2.1，假设 A 国是劳动力丰富的国家，B 国是资本丰富的国家，且 X 产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Y 产品是资本密集型产品。那末，在图中可表示为：A 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偏向 X 轴，而 B 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偏向 Y 轴。由于假设两国有同样的消费者偏好，故两国的消费无差异曲线是一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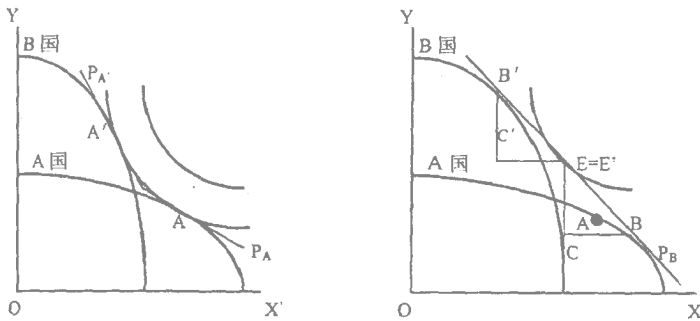


图 1.2.1 要素禀赋理论图解

在两国进行自由贸易前，最佳的产品生产与消费组合分别在无差异曲线与生产可能性曲线相切的切点处，即 A 点与 A' 点。其中，A 点为 A 国的生产与消费的最佳产品组合，A' 点为 B 国的生产与消费的最佳产品组合（如左图）。

此时，A 点处的斜率表示 A 国的 X 产品的价格与 Y 产品价格之比，即： $P_A = (P_X/P_Y)_A$ 。A' 点处斜率表示 B 国的 X 产品价格与 Y 产品价格之比，即： $P_{A'} = (P_X/P_Y)_B$ 。显然， $P_{A'} > P_A$ 即 A 国 Y 产品的相对价格高于 B 国，或 B 国 X 产品的相对价格高于 A 国。所以，B 国在 Y 产品上有比较优势，而 A 国在 X 产品上有比较优

势。这样，在两国发生自由贸易后，A国会出口X产品，而进口Y产品，B国会出口Y产品，而进口X产品。这正好证明了要素禀赋理论，即：劳动力丰富的国家（A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X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Y产品），反之亦然。显然，各国在密集使用本国丰富要素的产品上有比较利益。因此，出口密集使用本国丰富要素的产品也就是集中生产本国有比较利益的产品。由此也就说明了比较利益学说。

同时，我们可以从右图看出，两国进行自由贸易后，A国产品生产组合点会由原先的A点移向B点，即生产更多的X产品，较少的Y产品。B国的产品生产组合点会由原先的A'点移向B'点，即生产更多的Y产品，较少的X产品。这时，两国的产品消费组合点都在E点。这一消费组合点所处的无差异曲线比原先的要高，反映两国生活水平的提高。通过两国生产可能性曲线切点的切线斜率 P_B ，表示自由贸易后，两国的商品交换比率，即： $P_B = (P_X/P_Y)$ 。图中还说明，A国在B点生产，在E点消费，国内生产的X产品多出BC，Y产品少了CE，而B国在B'点生产在E点消费，国内生产的X产品少了C'E，Y产品多出B'C'。当 $BC = C'E$ ， $CE = B'C'$ 时，国际市场的供求就刚好达到均衡。即A国出口BC数量的X产品，进口CE数量的Y产品，B国出口B'C'数量的Y产品，进口C'E数量的X产品。两国贸易后的无差异曲线都比原来的无差异曲线提高，说明国际分工可以产生贸易利益，提高国民福利。

二、关于对外贸易是“剩余产品的出路”学说

亚当·斯密在提出“绝对利益”学说的同时，还从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对外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对外贸易为一国的剩余产品提供了出路（Vent for Surplus）。因为，在他看来，参加国际贸易的各个国家都是出口本国土地和劳动产品的剩余部分，这些东西如果不输出国外，就没有任何价值。而对外贸易使这些原

来没有价值的剩余产品具有价值并得以实现，从而增加了各国的福利。此外，国际贸易使各国市场扩大，刺激了各国努力增加生产，改进技术，使各国“有机会实行新的分工和提供新技术”，^① 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

近代经济学家对斯密这一学说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和解释，认为，这一学说对于发展中国家更为适用。从微观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资源利用缺乏效率的问题。资源利用缺乏效率这一概念，具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一国所拥有的各种生产要素未得到充分利用，致使该国的生产均衡点落在生产可能性曲线内（如图 1.2.2 中的 A 点）。这就是微观经济学中所说的 X—低效率（X—Inefficiency）；另一方面，虽然本国的社会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但是，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过多集中于某些低层次的产品，造成低层次产品的过剩供给以及高层次产品的供给不足，这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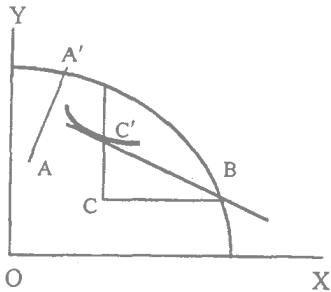


图 1.2.2 资源利用
缺乏效率与出路

意义的缺乏效率被称为“配置的低效率（Allocated Inefficiency）”。图 1.2.2 中的 B 点，就反映了一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只能过分集中于低层次的 X 产品的生产上，造成 X 产品的过剩供给以及 Y 产品的供给不足。结果，该国的消费组合仍然是回到生产可能性曲线之内的 C 点。

如果存在资源利用缺乏效率问题的国家参与国际贸易，便可以为原来的过剩产品找到出路，使该国的生产增长，福利水平提高，解决原来的资源利用缺乏效率问题。如图，若一国在参加国际贸易前，生产与消费组合处于生产可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4年，下卷：20页。

能性曲线之内的 A 点，即出现 X-低效率状态。当该国与世界发生贸易后，就可能在扩大后的市场刺激下，使过剩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新的生产均衡点就会移至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的 A 点处。

另外，若该国在参加国际贸易前是处于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即生产均衡点处于图中的 B 点，消费均衡点处于 C 点。参加国际贸易后剩余的 X 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找到了出路，并且可用以交换 Y 产品，满足国内需求，使消费均衡点变为 C'，即本国资源配置低效率的问题得以解决，福利水平得以提高。

三、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学说

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Engine for Growth）学说是经济学家罗伯特逊（D.H. Robertson）在本世纪 30 年代首先提出来的，后来引起经济界广泛的兴趣。经济学家诺克斯（R. Nurkes）在 50 年代对 19 世纪以英国为首的发达工业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带动了新移民地区国家迅速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深入分析，进一步证明了罗伯特逊的命题。

从 19 世纪初起，世界的工业主要以英国为中心。由于英国当时工业生产以及人口的迅猛增长，加上本国自然资源贫乏，导致英国对国外农产品以及原材料的巨大需求，从而极大地刺激了新移民地区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乌拉圭以及南非等国家）农产品以及原材料的出口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从 1815 年到 1913 年，英国人口增长了 3 倍，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 10 倍，进口贸易额增长了 20 倍。这种经济迅速增长形成的巨大需求，通过国际贸易带动了新移民地区经济的起飞，使得其中一些落后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等国家）迅速完成了工业化的进程，并在 19 世纪末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

诺克斯认为，国际贸易除了使各国按比较利益的规律进行分工，促进国际间的资源有效配置，从而获得静态的经济利益以外，

更重要的是国际贸易使发达国家对农产品及原材料的迅速增长的需求传递到发展中国家，使这些国家的出口产业获得迅速增长，这种增长又以“乘数效应”传递到其他非出口产业中，从而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正如诺克斯所说，19世纪的国际贸易“具有这样的性质：中心国家经济上的迅速增长，通过国际贸易传递到外围的新国家去。它是通过对初级产品迅速增加的需求而把这种增长传递到那些地方去的。19世纪的国际贸易不仅是简单地把一定数量的资源加以最适当配置的手段，它尤其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①

但是，包括诺克斯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对20世纪以后，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观察，并未发现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通过国际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起到巨大推动作用。造成罗伯特逊学说在20世纪不再适用的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初级产品的国际市场需求萎缩，贸易条件恶化，加上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使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加并未带来国民收入的相应增加，从而造成国民经济发展远远滞后于对外贸易的发展。

到了本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世界经济进入了繁荣时期，发达国家推行贸易自由化，推动了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从而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进而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又显突出。一些经济学家对若干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出口贸易额的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估算，结果发现它们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例如，埃默里（R.F. Emery 1967）估算出1953~1963年间50个国家地区的出口增长率与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82，由此说明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曾对85个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贸易与经济增长率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对外贸易增长率越高的

R·诺克斯：《世界经济中的均衡与发展》，商务印书馆，1961年，242~244页。

国家，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也越高，反之亦然。从而也说明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这一研究结果见表 1.2.1。

表 1.2.1 1960~1968 年 85 个发展中国家与地区贸易和发展状况

各类国家 与地区	数 目	出口增长率 (%)	进口增长率 (%)	GNP 增长率 (%)	出口占 GNP 百分比 (%)
高速发展组	22	13.4	10.5	8.1	19.2
中速发展组	33	4.4	4.8	5.0	15.9
低速发展组	30	2.4	0.7	2.9	8.8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国际贸易评论，1970年，(4) 37页。

四、产业内贸易学说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 (P.R.Krugman) 在 1984 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工业国家间贸易的新理论》的论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产业内贸易学说。他认为，传统的比较利益模式都以规模报酬不变以及完全竞争假设为前提。这只能解释各国在不同产业按各自的比较利益进行分工的情况，而无法解释要素禀赋以及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之间，同一种产业内的分工和贸易规模为什么会这样大。因此，他主张：“把规模经济和比较利益相结合作为贸易产生和贸易利益的主要原因。”^①

事实上，在工业生产中，许多产品的生产都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即产品的平均成本随着产量上升而下降。这就是我们在微观经济学中所熟悉的规模经济原理。另外，克鲁格曼认为，现代国际市场也不像传统贸易理论假设的那样，同一产业的产品完全无差别，并且处于完全竞争状态。实际情况是同一产业的产品有多种类型，因此，大多数工业产品的市场是垄断竞争的。

在规模报酬递增与垄断竞争的条件下，同一产业内的国际分工，可以增加各种不同类型的产品的需求，从而使参与国际分工的各国获得规模经济利益。如图 1.2.3，若一国在参与国际贸易前，

① P·R·克鲁格曼：《工业国家间贸易的新理论》，世界经济译丛，1984年(4)：37页。

国内对某类产品较小的需求 D_1 使国内生产达到长期均衡后，产量为 Q_1 ，长期平均成本为 P_1 。当该国参与国际贸易后，由于市场的扩大，需求增加为 D_2 ，使得国内厂商可以将产量增加到 Q_2 ，长期平均成本则下降至 P_2 ，从而获得了规模经济的效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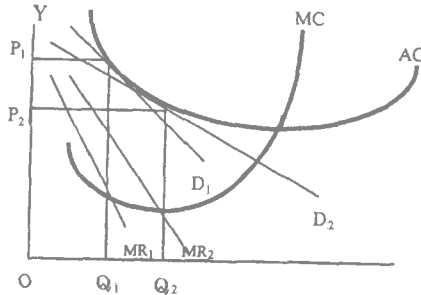


图 1.2.3 垄断竞争条件下的规模经济效益

由于消费者偏好的多样化，同一产业的产品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囊括一个行业全部类型的产品，从而造成了产业内贸易的必然性。当然，具体的分工模式是由分工前各国在某类产品的生产上的优势（哪怕是非常微小的）来决定。如果是完全没有差别，则可以通过协议分工的形式来产生使双方都能获得规模经济的分工模式。由此可知，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会使各国通过增加规模效益的途经来提高要素的边际产出率，从而实现要素投入不变情况下的经济增长。

五、对外贸易悲观论

虽然，有关贸易促进增长的研究中，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大量的理论和学说，深入分析贸易促进增长的机制，并且提供了大量的实证分析结果，支持贸易对增长的促进作用。但是，也有不少经济学家提出与之相反的理论及论据，说明贸易在一定条件下，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反而会对增长起阻碍作用。80年代后期以来，

以庄格和马歇尔（Jung and Marshall 1985）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所作的实证分析，并不能给出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力证明。尤其是 70 年代后期以来，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受到严重阻碍，以至“出口悲观”论日益蔓延。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莱维什提出他的“中心—外围说”来解释对外贸易会使发展中国家日趋贫困化的机制。这一学说被 A·伊曼纽尔和 S·阿明等经济学家加以进一步发展，并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普莱维什（R.Prebish）是当代著名的阿根廷经济学家，第一届“第三世界基金奖”（1981 年）获奖者。他从 50 年代起，开始集中研究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及其经济发展的的问题及对策，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与贸易发展的理论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普莱维什的“中心—外围说”认为，中心体系由发达国家构成，外围体系由发展中国家构成，两个体系的技术结构根本不同。中心体系是技术的创新者和传播者，外围体系则是技术的模仿者和接受者。两个体系的产业结构也不同，前者生产和出口制成品，进口原料、燃料和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后者则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进口制成品。因此，在国际分工中，中心体系处于独立的、主宰的地位，而外围体系则处于依赖的、从属的地位。中心体系获得技术进步的全部成果，外围体系则不仅分享不到中心国家的技术进步成果，反而连自己的技术进步成果也几乎完全被中心体系掠夺。中心体系实行霸权主义政策，不但拒绝改变世界经济秩序的现状，而且反对外围体系迫切要求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要求，“一旦外围有意无意地损害了这种经济和政治利益时，中心——特别是主要中心——往往就会采取惩罚的措施，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通过军事干涉的手段进行报复”。^①

同时，在两个体系的贸易交往中，贸易条件越来越不利于外围

^① R·普莱维什：《我的发展思想的二个阶段》，世界经济译丛，1983 年（11）：12～21 页。